热点聚焦

翻译架起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桥梁

■ 唐 磊

中国共产党善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为己所用，对翻译的重要性早有认知自觉。中外翻译家们的创造性和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为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语言系统中的受众建立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理桥梁，从而为相互承认、相互理解和相互借鉴铺平情感与理性之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25日给外文出版社外国专家回信，在外文出版社成立70周年之际，向全社员工致以诚挚问候，对外国专家予以亲切勉励。日前，外文出版社的5名外国专家给习近平主席写信，讲述了参与翻译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图书的深切感受，表达了从事让世界读懂中国工作的自豪心情。习近平主席回信勉励外国专家们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付出的辛勤与智慧，他在回信中特别指出，通过准确传神的翻译介绍，让世界更好认识新时代的中国，对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很有意义。这一回信需要多角度、全方位地认识和领会。

翻译是开展文明互鉴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环节

习近平主席从文明进步的高度肯定了历史上重要的跨文化翻译运动，包括历史上佛经汉译、近代西方学术文化著作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翻译传播，以及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在欧洲的流传，强调了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巨大作用。

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奠定，西方现代文明的开拓，是不同文明经济、制度、文化等元素交流的结果，翻译是不可或缺的中介桥梁。中国共产党善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为己所用，对翻译的重要性早有认知自觉。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将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视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新时代以来，面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和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现实，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要让“中国之治”的好故事好道理“说得出”“传得开”，精准的翻译至关重要。

翻译工作者最常遇见的困惑之一就是，许多情况下，译入语中的重要思想或概念在译出语中无法找到直接对应的词汇。中国哲学中的“道”、西方哲学中的“Dasein”，就是典型例子。这个时候的翻译就需要充满智慧的创制。对此，前述5位写信专家之一的中国外文局资深英文编审大卫·弗格森体会尤深。诚如他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的专访中所说的，克服跨语言跨文化理解壁垒的有效办法，就是将重点放在准确传达信息而非字面对应一致，甚至不惜进行创造性改写。这有点像朱光潜、钱钟书等翻译大家主张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但要做到这一点相当不易。今天我们“日用而不知”的众多现代汉语语汇本身就是文化迁移的产物，不少现代汉语词汇的创制已经造成了词义的偏移，如果不注意中西看似对应的语词背后文化背景、思维习惯的差异，就会造成理解错位。例如，当代中国日常话语中经常出现的“科学决策”“科学领导”这类表述，这里的“科学”一般被直接英译成“scientific”，但在英文中，“scientific”作为形容词主要是形容与自然科学（science）有关的事物，比如“自然科学研究（scientific research）”，而与前述中文用法里的“科学”的内涵根本不同。这种直译只会让受众感到困惑，需要更为精准的翻译。

当代融通中外的翻译事业需要外国专家的参与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新路的百余年征程上，有一大批致力于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外国友好专家，其中包括索尔·艾德勒、爱泼斯坦、夏庇若、魏璐诗、沙博理、戴乃迭、陈必第、李敦白、帕特·爱德乐等诸多可敬可亲的名家。他们不仅具有精湛的语言能力，更重要的是拥有对中国的真切认识与真挚情感，是现当代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当之无愧的“语言看门人”。迄今成立70年的外文出版社，以40多种文字翻译出版了3万多种图书，其中大量作品背后都有外国专家伏案耕耘的身影。许多重要的中国文学经典，如古典小说“四大名著”、《鲁迅诗选》《两地书》《西湖揽胜》《家》《林海雪原》《创业史》等，都是经过他们艰苦卓绝的努力才有了可以信赖和传诵的译本。

著名诗人、翻译家余光中先生曾经提出，“最理想的译法，应该是中外的学者作家两相合作，中国人的中文理解力配上英美人英文的表达力，当可无往不利”。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翻译事业，在中央编译局（现隶属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但对外保留中央编译局牌子）、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等“翻译国家队”中，广泛采用了这种中外专家共同合作的理想模式。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并传为佳话的，是像杨宪益与戴乃迭、李风白与戴妮丝这样的翻译伉俪组合。前一组译坛名家为世界贡献了最受欢迎的《红楼梦》英译本，后一组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等党和国家重要文献法文版翻译的重要承担者。此外，还有将《中国针灸学概要》这样高度专业化的图书精准、成功翻译和介绍到英语世界的英语专家陈必第，她的丈夫是20世纪中期我国著名的胸外科大夫张纪正先生。在通往翻译“信达雅”境界的过程中，中国专家往往更擅长把握“信”，外国专家往往更有助于“达”与“雅”。这样的合作过程本身既是融通中外的智识过程，也是文明互鉴的一种具体实现。

一些长期生活在中国、浸淫于中外翻译实践的对华友好的外国专家，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通”，进而撰写出直接向世界讲述中国的精彩著述。例如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爱泼斯坦1947年于美国出版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对当时西方世界了解正在兴起的新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卫·弗格森先生近年来也出版了《生态北京：绿韵新城》《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创造”》等介绍新时代中国成就的畅销书。

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夯筑基础

习近平主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知识交流与文化碰撞的过程并不必然是平等和开放的。近代以来，中西之间的知识交流就长期处于西强东弱态势下，主要是东方学习西方，甚至一度走入盲目引进西方思想的种种误区。另一方面，不同民族和国家间的文化碰撞尤其是意识形态碰撞常常表现为紧张对抗。著名“中国通”、《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作者马丁·雅克教授也提出过，“中国崛起所带给世界的真正挑战很可能就是文化”。这种现象提醒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需要以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交流互鉴化解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文化冲突。

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观基础是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彼此应相互尊重，在此前提下，才能开展取长补短、彼此助益的互鉴过程。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是一个事关“认同”或“承认”他者的过程，其中，准确理解他者又构成“承认”的基础。中外翻译家们的创造性和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为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语言系统中的受众建立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理桥梁，从而为相互承认、相互理解和相互借鉴铺平情感与理性之路。

就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英译，较为常见的译法有“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和“a community with common destiny”两种。如果采用后者，似乎就带有一丝“天注定”的色彩，不符合该概念原本希望传达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也与人类应当面向开放未来的追求不合。因此，我们的“翻译国家队”经慎重考虑和斟酌后正式采用了前一种为官方权威译法。在这样的案例中，跨文化翻译本身就是在积极有为地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

学者看法

加快构建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理论体系

■ 邓志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入发展，中国共青团事业蓬勃发展。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共青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推进各项变革，不断推动工作实现新发展。实践呼唤理论，实践探索无止境，理论创新亦无止境，这要求理论研究者在实践中加快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揭示新时代共青团工作规律，推进新时代共青团工作高质量发展。

找准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理论体系建构的立足点。找准立足点，就是树立“以青年为本”的价值取向。回顾共青团百年历史，在党的领导下，共青团在坎坷中创造峥嵘，从苦难走向辉煌。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党的四个历史时期总能围绕国家战略和党的中心工作，团结带领一代又一代青年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为党赢得了广大青年。百年历程中，共青团工作的理论建构是不可或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理论要突破传统的话语框架，达成有共识的价值观。“以青年为本”正是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理论体系建构的立足点。共青团工作是党的青年群众工作，共青团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共青团工作的逻辑归旨就是为党育人，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以青年为本”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理念，充分体现了党建带团建的原则，充分体现了党的群众工作路线。

把握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理论体系建构的根本点。把握根本点，就是理顺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框架，推进共青团工作理论学科化、专业化和系统化。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几种基本关系。一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的关系。二是中国共产党与青年的关系。三是中国共青团与青年的关系。四是中国共青团与青年运动的关系。五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照顾青年特点的关系。六是青年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化的关系。七是共青团继承传统与深化改革的关系。八是共青团的政治性和先进性、群众性的关系。九是共青团引领青年和联系青年、服务青年的关系。十是共青团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基础理论揭示共青团组织的基本运行规律，其核心是回应“共青团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党团观、群众观和青年观，以及共青团的性质、地位、职能、构成、运行等基本议题。应用理论主要回应“共青团怎么干、怎么干好”的实践性问题，包括团的组织学、团的工作学、团的改革论、团的关系论等。

抓住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理论体系建构的着力点。抓住着力点，就是抓住问题、回应问题和解决问题。着力点是以问题为导向，回应共青团工作面临的时代之问。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时代之问是新时代培养什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建设什么样的共青团？怎样建设共青团？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理论体系要紧扣上述时代之问，深入研究，作出回应。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共青团工作和建设依然存在与新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共青团改革过程中依然遇到一系列问题和难题；基层团组织的“四缺”问题和团的机关“四化”问题仍需进一步破解……以上种种，均亟需共青团工作的理论界作出回应和回答。值得反思的是，共青团工作的理论与方法的发展目前还相对滞后，时代发展与共青团工作理论演进出现一定落差，共青团工作的理论研究者应积极探索共青团工作的理论体系与时代发展之间的关系，加快构建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理论体系，以期更好地指导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实践。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湖南省团校副校长）

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关于“国之大者”重要论述的鲜明特征

■ 刘宏伟 朱穆朗玛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这从来不是一纸空谈，而是脚踏实地的行动。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各级领导干部应始终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把“国之大者”理念付诸行动，提升政治执行能力，强化政治治理效能。

“国之大者”，顾名思义，是指关乎国家利益与发展方向的大事与要事。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此后，“国之大者”作为高频词多次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报告之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专题，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之大者”的重要论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国之大者”的深邃思考与实践总结。深入学习领会关于“国之大者”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可以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国之大者”的考量，始终突出问题导向，显示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内含真挚的人民情怀与务实的战略智慧，为新形势下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突出的问题导向

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之大者”重要论述的鲜明特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不懈努力之下，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是，仍有一些党员、干部“政治意识不强、政治敏锐性不高，不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对‘国之大者’不关心，对政治要求、政治规矩、政治纪律不上心，对各种问题的政治危害性不走心，对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不用心，讲政治还没有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显然，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对心怀“国之大者”念兹在兹，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些问题。

2020年10月，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形势和局面，只有做到心怀“国之大者”，才能超越局部、地方和部门狭隘视野的限制，才能实现以大智慧、大担当、大格局肩负起国家发展的历史重任。

“国之大者”正是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当前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的药方，这一论述对于确保我们党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保持清醒头脑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深厚的文化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之大者”的重要论述彰显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引与创新。

一方面，这些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国之大者”本就是一个扎根于中国治国理政传统的概念，我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对于关乎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问题一向都十分重视，强调要在繁杂的行政事务中分清主次缓急，并将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大事与要事称之为“国之大事”“国之大柄”。如《左传》中就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表述，意指将祭祀和军事视为国家大事；《旧唐书》中有“国之大柄，莫先择士”的提法，即是将选贤任能视为国家要事。传统文化中对治国理政要领的深入思考，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之大者”的重要论述，体现了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和对中华文明脉络的赓续。

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之大者”的重要论述，是立足新时代这一崭新的历史方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国之大者”的具体内涵显然不尽相同。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这意味着在享受过去难以想象的良好发展条件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诸多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与挑战，这给我们党治国理政带来了巨大考验。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拓展了“国之大者”的时代内涵，使之升华为体现新时代特色的政治理念，引导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和坚定地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

真挚的人民情怀

“人民”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之大者”的重要论述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曾几次清晰点明“国之大者”的重要内涵：2021年4月在广西考察时指出“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2021年6月在青海考察时强调“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2022年3月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提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无论是人民生活幸福、生态环境保护，还是粮食安全，都关乎人民的切身利益，这一系列论断充分彰显出习近平总书记“国之大者”重要论述中所蕴含的真挚的人民情怀。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这从来不是一纸空谈，而是脚踏实地的行动。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强化责任担当，不折不扣抓好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因为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始终强调其“国之大者”的重要地位，并在实践中加以落实，才能最终实现带领全党赢得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并在努力推动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事业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各级领导干部应始终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把“国之大者”理念付诸行动，提升政治执行能力，强化政治治理效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确保我们党持续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夯实党的执政根基，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之大者”重要论述的要义所在。

务实的战略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之大者”的重要论述，也彰显了务实的战略智慧。“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之大者”的重要论述，不只局限于一时一事、一局一域，而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汇的历史节点上，面对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对全体党员干部所应坚持和把握的重大原则、重大利益、重大决策进行的前瞻性思考和战略性谋划。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心怀“国之大者”，其核心在于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在面对当下国内存在的新挑战、新问题、新矛盾时，能够认识到并优先解决其中关乎全局、关乎长远、关乎根本的问题。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国之大者’，锚定党中央擘画的宏伟蓝图，观大势、谋全局、抓大事”。其中，观大势就是要增强工作的预见性，也即立足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做到对影响国家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心中有数，实现在严峻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谋全局则侧重强调提升整体思维能力，注重从大局出发，以更高的站位、更宽广的视野来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抓大事则是要摆正问题的解决次序，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关键问题的解决之中。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之大者”的重要论述既立足全局、面向未来，又扎根本土、切中现实。面向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只有始终心怀“国之大者”，积极作为，有效作为，才能确保以持之以恒的精神状态和矢志不渝的奋斗姿态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持续向前发展。

【作者刘宏伟系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朱穆朗玛系该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统筹发展和安全视域下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21VSZ069）的阶段性成果】

青年研究

培养扎根基层的青年乡土文化能人

■ 王克修

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带货成为“新农活”，是乡村振兴中的一道新风景。青年艺术人才可以把乡土的内生智慧与创意设计相结合，挖掘乡村的历史文化底蕴，将乡村艺术文化与旅游产业有机融合，助力打造乡村文化旅游特色品牌。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专门提及，“培养扎根基层的乡土文化能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基层文化设施和文物管理人员”。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重视发现和培养扎根基层的乡土文化能人。”随后，各个时期国家文化发展规划等重要文件中继续对此不断给予强调，表明党和国家对乡土文化能人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积极作用的充分肯定。当前，要将青年人才聚起来、用起来、留下来，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青年人才队伍，以多元化青年人才为支撑，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青年人才工作队伍，助力乡村振兴全面实现。

青年乡土文化能人是指扎根基层、在文化领域拥有专长的各类青年文化人才，可分为工艺美术类、表演艺术类、文学创作类、通俗文化研究类、文化传承类、文化活动组织类、公益性文化类和综合类等类型。我国目前开展青年乡土文化能人方面的研究和实践还不够，一是青年乡土文化能人的特点、培养机制、政策扶持等方面的研究相对欠缺；二是青年乡土文化能人总量较少、质量不高、后继乏人；三是思想不够解放，观念更新慢，获求新知识、新事物、新方法的愿望不强烈；四是农村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目前还不够完善。

8月22日至26日，中国青年报社推出了以“奋斗正青春 以才著华章”为主题的“青年人才周”系列活动，正在书写新时代的“青年有才”故事。值此之际再度审视“培养扎根基层的乡土文化能人”，需要多措并举培养更多扎根基层的青年乡村文化能人。

以开放的态度吸引青年乡土文化能人扎根基层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土文化能人。用好乡土文化能人，还需要秉持开放的态度，在本土人才走出去的同时学会引进来，充分利用乡村新乡贤、能人精英等乡土人才和文艺团体，扭转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的“空心化”，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劲动力。还要引导社会各类人才积极投身乡村文化振兴过程，组织文化部门和艺术团体深入乡村开展文化艺术活动，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智力支持。

怎样留住并吸引青年乡土文化能人回乡创业呢？乡村市场潜力巨大，政府的人才发展战略可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人才下乡，双创基地可以设在乡村，比如一个庄园开设一个总部，一个庭院设置一个总部。或者一些从事软件开发的IT行业，也可以适当地进入村庄，因为只要把信息基础设施、比如宽带装进去之后就基本能满足办公条件，某些公司或适合的特定部门也就可以搬到农村。把智创、文创、农创等引入乡村。

搭建青年乡土文化能人培训交流的平台

即便在本地已经算是文化能人，乡土文化能人也同样面临着持续提高、防止艺疏的问题，也面临着全面提高、避免“短板”“短腿”的问题。简而言之，乡土文化能人的长久文化事业，离不开乡土文化能人的持续专业学习。这也就要求应该经常组织开展面向青年乡土文化能人的培训和交流。政府可以出面邀请高水平的文化名人和民间艺人为本地的青年文化能人和文化积极分子授艺支招。政府还可以牵头定期组织举办会演、调演、比赛之类的活动，为各类青年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同台竞技、互相学习提供平台和机会。

充分发挥青年乡土文化能人在乡村文化振兴创新中的作用

一方面，要发挥青年乡土文化能人在短视频和直播中的作用。数字乡村建设大力推进，一批批掌握数字技术、具有互联网思维的青年人变身“新农人”，投身农业农村发展。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带货成为“新农活”，是乡村振兴中的一道新风景。近年来，国家不断推动关于数字化乡村人才队伍建设。2022年6月，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发布《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乡村振兴带头人培育“先锋计划”2022年度工作方案》，提出要以推进72个共建先行县数字技术转化应用、农业产业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县域农业农村发展实际需求，突出需求导向、双向匹配、实践转化、长期合作，通过线上学习、集中培训、咨询问诊、一县一策深度合作，打造一批通俗易懂的短视频制作、直播带货类学习资源；培育一支具有数字思维能力、服务农业产业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的乡村振兴带头人和青年乡土文化能人。

另一方面，要发挥青年乡土文化能人在艺术赋能乡村振兴中的作用。艺术是永恒、无价、可持续发展的。要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把自然呵护得更加自然，就要用更加永恒的文化艺术融入乡村建设中。乡村振兴是个系统工程，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都需要人才来推动落实。青年艺术人才作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的一支重要力量，可以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乡土优秀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发挥作用，是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力军。特别是青年艺术人才可以把乡土的内生智慧与创意设计相结合，挖掘乡村的历史文化底蕴，将乡村艺术文化与旅游产业有机融合，助力打造乡村文化旅游特色品牌。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研究员）